

The Lab, the Temple & the Market:

Reflec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沙伦·M.P.哈珀 主编

Edited by Sharon M.P. Harper

张继涛等 译

江立华 审定

实验室·庙宇·市场

——对科学、宗教和发展的
交互作用的反思

 广东人民出版社

The Lab, the Temple & the Market:

Reflec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cience,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实验室·庙宇·市场
——**对科学、宗教和发展的
交互作用的反思**

沙伦·M.P. 哈珀 主编

Edited by Sharon M.P. Harper

张继涛等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与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DRC) 合作出版

Publish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Canad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验室·庙宇·市场：对科学、宗教和发展的交互作用的
反思/ (加) 沙伦·M.P.哈珀著；张继涛等译. —广州：广东
人民出版社，2006. 3

(西方社会学前沿译丛)

ISBN 7-218-05219-3

I. 实… II. ①沙…②张… III. 宗教社会学

IV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835 号
版权登记号：192004117

中文译本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DRC) 授权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This translation into Mandarin Chinese, published by the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has been authorized by Canad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2005

责任编辑	崔肇钰 倪腊松
封面设计	卢小雅+何 筠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 页	4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5219-3/B·180
定 价	20.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当公司统治世界

第二版

戴维·C. 科顿 著

David C. Korten



靠不住的诺言—— 贫穷和第三世界 发展的背离

第六版

约翰·伊斯比斯特 著

John Isbister



成功之源—— 对第三世界国家 农村发展经验的总结

诺曼·厄普霍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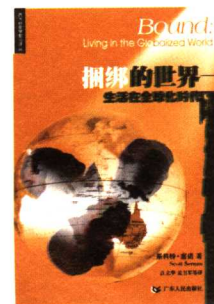
Norman Uphoff

米尔敦·J. 艾斯曼

Milton J. Esman

安尼路德·克里舒那

Anirudh Krishna



捆绑的世界—— 生活在全球化时代

斯科特·塞诺 著

Scott Sernau

前 言

世界上恐怕只有那些无比天真或者故意装聋作哑的人才会相信，国际发展机构在经历了半个世纪持续不断的努力以及投入了亿万巨资之后，总算“获得了成功”。然而，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感觉告诉我们，我们实际上是失败者。的确，发展机构曾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于这些机构开展的项目，由于其工作人员的无私奉献，还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天，更多的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食品、更长的寿命、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以及更加便捷的通讯手段。

然而，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的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包括物质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贫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地区，教育、卫生和就业体系已经分崩离析。地球正在我们高歌猛进的工业发展导致的毒污环境中呻吟，而我们的发展模式却只重视消费。许多国家的人口水平超过了本国供应基本需求的能力，更不用说供应日益增长的挥霍性消费需求的能力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面临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社会分裂，犯罪、腐败和暴力只不过是分裂的外在表现而已。以西方的流行文化还有社会及亲缘关系纽带的撕裂为标志，全球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转变使整个人类社会丧失了传统了精神文化参照系，并导致了令人不安的社会疏离和精神疏离。

我不是说可以将这些问题一股脑儿地归罪于国际发展机构

和发展模式，但是，这些问题确实表明，在发展过程中，一定有什么因素被我们忽略了，或者，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现它。大多数发展机构都受到了一个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和实证主义的世界观的影响；或许，我们难以听到来自机构之外的、与我们的世界观不同的人们的声音。

许多人将他们自己、其日常决定及他们的希望置于道德体系和宗教体系的背景下，而发展机构通常将这些体系置于发展模式之外。三十多年来，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DRC）一直致力于探讨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数年前，中心决定开展一项谨慎的研究，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的行动领域是如何与人类精神和宗教方面的幸福联系起来的。对我们这样的机构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有争议的领域，因为IDRC习惯于将宗教和精神方面视为私人事务，它们在我们的职业生活或公共领域（如“国际发展”领域）中没有一席之地。我们不能确定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以及该由谁来做这件事情。

最终，我们幸运地遇到了四位有着不同文化和地区背景的人。他们都是各自宗教传统的信奉者，并且都接受过作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应该受到的训练。他们愿意携手探讨科学、宗教与发展是如何在其个人的和职业的世界观中联系起来的。尽管我们打算吸纳来自各种宗教传统和科学门类的人来参与这一工作，但是我们决定让这四位研究者先行一步并希望其他的人能随着研究的推进而加入进来。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开创广泛研究的新阶段。

我们这些IDRC的成员及其他人不清楚这个实验性研究将取得何种结果。至少，我们希望它能丰富我们的发展思想并能为我们开展工作带来有益的启示。我们也希望本研究能为逐渐

升温的，对科学的、宗教的与“发展的”世界观的关系的全球性讨论作出贡献。当然，如果有更多的人关心并支持我们的研究那就再好不过了。我认为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对政府和发展机构而言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即如何将现代世界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创造性用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同时又能尊重并反思有关宗教和传统文化领域与人类幸福的关系所体现的潜在价值观。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副主席 皮埃尔·毕曼斯

序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厘清科学、宗教与发展（science, religion and development, SRD）的关系，即使只是走马观花，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前，SRD 领域的研究仅有的几项内容是：全球的或普遍的伦理；伦理与发展；宗教或信仰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忧的回应；宗教与发展；宗教性的发展行动；全球化问题与文化价值观；本土信仰体系和知识；增进宗教间的对话与理解的努力；以及以信仰为基础的冲突解决之道。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的 SRD 研究项目是为梳理这个由疑问、关注和丰富的洞见拧成的一个丛结而作出的一个谨慎的努力。这个项目就是为那些对促进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能力感兴趣的发展研究机构专门设立的，因为，SRD 项目为其研究信仰和科学在 50 年的发展历程中应该相互吸取什么提供了一个机会。

SRD 项目的第一个优点是，尽管相互关联的问题十分广泛，但它并不要求研究者改变其发展道路观或者重新评价其所掌握的各门学科的技能，而只要求他们阐明各学科的贡献以及信仰在其发展道路中的作用。每个研究者按照自身的视角和技能来撰写论文，这就使我们可以将不同风格的反思串联起来，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反思能使读者认识到各种科学讨论和发展讨论中的问题的相关性，并看到丰富的研究方法和结果。该项目

表明，有组织的宗教的及个人信仰的主导原则不一定会造成分裂或压制（尽管它们像学术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一样也可以被用来为此目的服务），信仰可以为科学事业提供强大的动力并使之取得惊人的成果。多数作者均强调他们的信仰使他们深刻地理解了联系性原则和同情意识并使其研究获得了广阔的视角。他们的研究范围甚至还包括了研究本身对其他的人们及其社会、生态系统、少数民族和边缘群体及至这个世界造成的影响。

SRD 项目的另一优点在于参与者的构成。该计划组成了一个核心群体，群体成员将各种学科和思想模式糅合在一起。当然，这个核心群体的成员还有这样一些特征：他们有着不同的行事方式；他们敢于拿传统的思维模式做实验；当接触到其他信仰体系时，他们勇于挑战自己的世界观。此外，他们对待自己的信仰的率真态度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学术共同体还不习惯研究信仰和神启问题。如果离开了这样一个群体，本书就不可能有如此综合的反思，因为他们的论文都是以自己的信仰和学科背景为基础，所以，这种学科交叉才充满了活力。在这里还要感谢所有与 SRD 研究项目有关的人，他们有的来自 IDRC 内部，有的来自 IDRC 之外，他们是：皮埃尔·毕曼斯（Pierre Beemans）、克里斯·斯马特（Chris Smart）、威廉·F. 莱恩（William F. Ryan），耶稣会士和凯瑟琳·克兰西（Kathleen Clancy），要特别感谢他们的指导、支持、智慧和辛劳。还要特别感谢克里斯·斯马特给本书取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名字，从而使它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

SRD 项目不断碰到的一个问题是，IDRC 作为一个发展研究机构是否应该坚持这种研究路径。由于源自宗教的冲突以及某些信仰和精神领域的模糊性，一些人肯定会对这样的研究焦点和研究方法感到不快。但那些项目参与者却从世界银行与来

自世界各地的九种信仰的代表最近就贫困问题展开的对话那里受到了极大鼓舞。SRD 项目还传达了越来越多的文献、令人兴奋的新的非政府组织以及那些告诉我们发展问题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的信件和邮件（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这个研究怎样才能更有意义？随着对其他文化和世界观的了解逐渐深入，它能揭示出支撑西方经济和科学假设的公认的价值观吗？为了重新思考“人类幸福”问题并且解决发展困境，它能探索出科学和宗教的新的互利关系的潜在可能性吗？宗教和信仰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观——有的相互重叠，有的还是新的——并由此为贫困、疾病、冲突和社会边缘化等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洞见和方法。

能为该项目服务并与项目参与者共同工作使我感到十分荣幸。由于本人的新闻学、法学、人权和神学背景的关系，我经常会问我能在哪里谋取一个职位以使我能探究这些问题以及在各个教育阶段学习到的技能。SRD 项目以一种很有意义的方式将这些知识领域汇集到了一起，这使我亲眼看到，那些富有思想、情系发展的人们（世俗社会的和宗教界的）以及那些充满爱心、全力以赴的机构（同样是世俗的和宗教的），为了创造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公正的、和平的和可持续的世界，正在奋发努力着。

沙伦·哈珀

2000 年 9 月

引言

法赞·阿巴伯 (Farzam Arbab)

20 世纪末，人类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风险。一些令人惊讶的现象都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全球化”一语让人心绪难平，大家对它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毫无疑问，全球化浪潮已经将世界各国推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崭新道路。世界的经济活动、政治结构和文化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随着阻碍人类走向团结的障碍被一一扫除，一个全球性社会正在破茧而出。此外，突飞猛进的科技也在为这场转型推波助澜；作为科学技术的早期成果之一，全新的通讯模式跨越了国家疆界并且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前进。

无论未来将多么令人陶醉，但当前的行为模式使人们对此不敢抱有奢望。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不强推一致性，全球化是否果真能使人类团结一致？还有，全球化是否只会推动消费主义文化的普遍化？它是广大人民幸福的承载者抑或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经济利益的代名词？它将会导致公正社会秩序的建立还是会巩固现行的权力结构？

保持这样的警觉并非毫无根据可言，因为，尽管不断地涌现出很多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手段，但各种问题仍旧层出不穷。就此而言，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当数全球发展事业的停滞不前，尽管它已经有六个年头了。这个问题是纷繁复杂的。首先，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某些显著成就，但贫困的步伐从未停

止过。这里所说的贫困不是那种人们通常所说的贫困，而是伴随社会团结纽带的断裂而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后果。其次，陈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环境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连环境的存继都成了问题。我们面临着造福于全人类的巨大挑战，但这个挑战不能仅仅依靠技术的应用及现存组织的计划的扩展来加以解决。因此，我们必须摒弃物质主义哲学，正是它造成了目前极度的贫困和不负责任的富庶并存的局面。

我们不能仅仅以因果分析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前进的动力。当统一性原则、联系性原则及公正性原则逐渐地深入人类的集体意识时，如此深刻的社会变迁应该被看成潜在的发展进程在此时出现的紧急情况。这种觉悟引发的全球性行动可能会是尝试性的、不充分的，它甚至还会受到某些野心和私欲的驱动。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待我们经验丰富之后，我们的精力会被不断地用来创造世界文明，这样的文明既体现了人类的团结一致又体现了人类的多样性。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评估发展领域，它的基本假设以及现行策略，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任务。

1997 年秋，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将我们一群有着不同宗教背景的科学家召集在一起，并要求我们通过研究科学、宗教和发展主题参与这项重新评估工作。我们所要采用的方法非常简单。中心要求我们检阅相关文献并从我们的亲身经历和信仰体系的角度反思与本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开碰头会以便大家交流思想。我们必须在工作底稿中提出个人的反思结果。这些文件将被整理成册并被送到更多的学者手中以对此作深入的探讨。我们一致认为这个主题非常有意义，尽管大家都有其他任务在身，但都乐意在未来一至两年内完成这项任务。

在这个项目之前，IDRC 曾对与精神和发展有关的问题作

了一个前期研究。威廉·F. 莱恩博士到过世界各地并访问了近 200 位在发展领域工作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其研究结果发表在《关于文化、精神和经济发展的对话》(*Culture, Spirit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pening a Dialogue* 莱恩 1995) 一书中。他的研究对我们大有裨益, 而他积极参与我们的会议和讨论活动同样使我们受益匪浅。此项研究表明, 各界都赞成在人类生活中给予精神领域应有的地位。但大家对企图解决所有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及正确的“技术性方法”的不满情绪也在上升(莱恩 1995, p. 4)。所有受访者一致认为, 地方性的文化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应该融入到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发展的研究中。就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关心发展的道德伦理层面时, 有些人走得更远, 他们开始寻求将其行动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 他们怀疑纯粹理性的道德规范的效果, 特别是当大家根据“狭隘的个人主义”对理性进行界定时更是如此(莱恩 1995, p. 42)。

不可否认的是, 那种认为纯粹物质主义的发展道路应被抛弃的主张得到了广泛支持。但问题是, 发展理论和实践怎样才能获得精神性的前景。发展成就取决于几个学科和专业, 它们都有各自的世界观。当形成各学科的理论框架使科学和宗教彼此对立时, 这些学科还会参与关于精神性的严肃讨论吗? 因此, 研究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发展的界面, 是任何企图改善发展思想当前的不平衡状况的努力必须迈出的一步。我们这个研究小组对此观点颇有信心; 我们还意识到, 现代社会的危机已经迫使科学家和神学家开始质疑对这种关系所做的唯物主义解释。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以及对唯物主义的缺陷的认识的深入, 我们深感 IDRC 决定探索科学、宗教和发展这一主题可谓恰逢其时。

本书收录的论文反映了我们对该主题所做的集体思考及个

人反思。它们在形式上不拘一格，在内容上也各有千秋。它们体现了我们的共识，即，当我们着手分析社会实在和知性实在时，无论我们采用什么方法，但都必须尽量明确各自的观点。就 SRD 项目的研究主题而言，本卷中的每篇论文都可视为抛砖引玉之作。

普罗米拉·卡普尔 (Promilla Kapur) 博士决定详细地考察她所信仰的宗教的教义。但是，她提交的并不是一篇关于印度教的神学论文。文中讲述了她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和活动家对自己的信仰体系的反思。她首先简要讨论了自己的世界观以及精神性，然后描述了印度教的突出特征。这一部分中的翔实的论据支持了其论点，即印度教的“兼容并包的历史”及其“终极统一的理念为现代社会制度和物质主义思维的分裂性后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见解和重要的制衡力量”。(卡普尔，本书，p. 3)。考虑到印度的宗教信仰体系经常被形容为发展的障碍，这个论断因而显得十分重要而且也很有必要。

卡普尔博士围绕着发展的定义，即发展是“对真理的揭示”，对其作了讨论。发展过程与个人、社会和宇宙密切相关(卡普尔，本书，p. 16)。以此为背景，她指出，发展领域需要宗教发挥适度的作用。她所持的科学观使她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科学和宗教的冲突不是一种必然现象。在她看来，自然科学探讨的是“物质以及外在世界的特征”(卡普尔，本书，p. 27)；宗教探讨的是“意识、精神以及内在世界的本质”(卡普尔，本书，p. 27)。由于存在“内部与外部不是分割的”，因此科学和宗教只能互相补充(卡普尔，本书，p. 27)。她希望两者能够产生良性互动并能共同迎接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阐述印度教能为全面发展提供哪些资源时，卡普尔博士采取了著名的甘地式立场。同样地，她还从争取实现萨尔乌达耶 (Sarvodaya) (圣雄甘地主张建立的新社会之名) 的斗争中

吸取了有益的思想。其指导思想显然是为了寻求一种发展战略，该战略能够实现科技成就与对宗教价值观的批判性审视之间以及西方的物力论与东方的精神观之间的平衡。

乔治·鲍姆将我们的思索引向了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基督教会发展的批判性态度，世界银行最近推动的与宗教的对话，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方面。他在提交给本书的论文中分析了这三个关注点。第一个议题包括了一些富于启发性的例子，它们主要来自罗马天主教会。这些例子说明，自从基督教会“听到了来自世界较贫穷地区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组织的抗议声”，他们就对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发展深感不安（鲍姆，本书，p. 76）。简要论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他概括了其所谓的天主教的抉择，即“从受害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公开表明与为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保持一致”（鲍姆，本书，p. 86）。他说道：

穷人的选择权在基督教会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本质，它以某种精神上的苦恼为标志，那就是：（1）我们被其他人的遭遇所深深困扰着，尤其是那些受压迫者（大多数人）；（2）我们对教会与帝国、殖民者以及其他形式的统治者过去和现在串通一气感到悲哀；（3）我们愿意置身于痛苦的和无答案的问题中，即如何将我们对仁爱的和无所不能的上帝的信仰与我们在世上见到的罪恶相协调。这种新的精神，虽然也有其自身的“灵魂阴暗面”，但它也并非毫无希望和活动能力。（鲍姆，本书，p. 86）

鲍姆博士对世界银行为与宗教展开对话所做的努力的分析表明，如果对话不受特权阶级的干扰，那么它将会取得一定的效果。通过提出研究中的主观性问题，即他的第三个关注点，他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如果受到狭义的

科学方法的限制，我们所做的研究将不会取得进展。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神存在的态度是否会影响他的研究和结论？鲍姆博士呼唤的不是对宗教的信奉，而是移情和开放。他要求发展研究“对人们自我构建的精神维度和威胁他们认同的当代西方的世俗假设方法获得特殊的敏感性”（鲍姆，本书，p. 100）。

阿兹赞·巴哈鲁丁（Azizan Baharuddin）博士在论文开头分析了这是当前学术活动的主要特点，区隔化和简化论，引起的后果。接着，她提出了自己的科学观、宗教观和发展观，并始终如一地强调了三者的内在联系。她呼吁道，“我们必须拥有一个全面的生态世界观，这个重新定位将使我们的经济观念和发展观念得到修正”（巴哈鲁丁，本书，p. 139）。在探讨宗教时，她对自己认为需要改变的宗教规范和惯例提出了质疑。这使她能自由地探讨伊斯兰教的精髓并充分介绍其教义的优点。

形而上学及其在人类行动中的作用这一部分对正在兴起的关于科学、宗教和发展主题的讨论是一个可喜的贡献。通过考察《古兰经》中的“J”（din）这一术语，巴哈鲁丁博士说明了伊斯兰教“涉及了生活的全部，或者就是真实生活本身”（巴哈鲁丁，本书，p. 160）。根据阿尔-艾塔斯（Al-Attas）的研究，她解释道，服从真主是伊斯兰教的根本原则，它与人类对真主的负疚感有紧密联系，因为真主创造了人类并维系着其生存。在负疚的情况下，人类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而且，“周围的一切、自身拥有的一切以及自己奉献出的一切都是造物主所赐”（巴哈鲁丁，本书，p. 161）。既然他们“自身就是债务”，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自己抵债，即“把自己奉还给真主”（巴哈鲁丁，本书，p. 161-162）。这种归还意味着为真主服务——因而也就是为人类服务——并且遵循真主制定的法则。巴哈鲁丁认为，正是对许多形而上学的观念的深刻理解，比如负债与服从

的关系，才形成了伊斯兰发展道路的基础。

我本人提交的论文以我在发展领域的工作经历（特别是在拉美地区的工作经历）为基础。多年以来，我和一群同事有机会联合起来行动以创造一种替代性的发展策略，在这种发展策略中，精神性原则被用于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之中。当前的项目的主题和方法充当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我能清楚地说明处于行动核心的科学和宗教的观念。我在文中力图描述一种巴哈伊教（Bahá'í）倡导的世界观，它将知识的创造和应用看成是发展得以产生的轴心。我认为，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地区增强个人、社会和机构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参与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过程中。

IDRC 的这个研究项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科学、宗教和发展的本质问题上达成一致的或统一的想法，因此，本书的四篇论文反映出了不同的认识和方法。但是，我们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仍然存有共识，特别是在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上，我们都不希望把宗教仅仅当成一个工具，即，要么把它当作一个哲学工具，要么把它当作一个恰好能促进物质发展的社会因素。我们也无意把宗教与消费主义、科学至上主义或政治权力联系起来。作为宗教信徒和科学家，我们认为宗教和科学都与实在有关。因此，我们从发展过程的各个方面——目的、策略、方法和行动——来研究宗教的作用。无论我们的观点正确与否，但我们还是希望至少能传递出一个基本信息：在历史上，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传统曾经在很多情况下为人类提供了指导；今天，它们仍然能够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精神洞见。与宗教反对者想当然的假设相反，多样性不一定会成为冲突和争斗的原因。没有必要总是根据“教派”和“宗派”观念来思维；人们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谈论宗教，就像他们谈论科学时一样，并且，能够研究两者的相互作用，因为它们共同引导着人类的进步。